

第四篇 石 刻

本篇主要按石刻保存较多的寺、庙、官苑、陵墓及博物馆等处，分为八章，共选录83条目。少数属纪念碑性质的，归入第三篇第三章。

广州现存碑刻，以隋《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铭》为早。唐韩愈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首标“海事”一词。越秀山出土的唐《王涣墓志铭》，对晚唐史研究颇有价值。北宋开宝六年(973年)《大宋新修广利王庙之碑》，碑阴有广东最高长官潘美兼市舶使的记载，可见当时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元丰二年(1079年)《重修天庆观记》，叙述三佛齐国(今印度尼西亚)人赞助修天庆观的情况，反映了宋代广州与南海诸国的友好关系。南汉药洲遗址尚存的九曜石，有宋人米芾等题刻；药洲碑刻则有翁方纲摹米芾题药洲石记和徐琪题《药洲八景图》等。苏轼南来，留有“六榕”题字，后人仰慕一代诗圣风采，在六榕寺精刻一石《苏文忠公笠屐像》。出土于清真先贤古墓附近的《高丽穆斯林刺马丹墓志》是广州首次发现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光孝寺保存的石刻不少，其中有载录海外高僧米华及传教译经等活动的重要史料。

清代碑刻以广州博物馆碑廊所存为重要，其内容有关于戏剧、银行、地图测绘以及鸦片战争史事等多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晚清广东刻帖盛行，现存有近年移置于光孝寺的《嶽雪楼鉴真法帖》刻石，还有潘仕成以巨资在广州历37年而成的《海山仙馆丛帖》刻石，都是当时广州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外，还有一批表彰纪念先烈的碑刻。其中黄花岗的碑丛，记录了为缔造民国而捐躯的志士们的悲壮事迹，表达了各界民众悼念敬仰的深情。

(黄鸿光 黄流沙)

第一章

光孝寺石刻

唐 大悲心陀罗尼经幢 在光孝寺大殿前左侧空地上。高1.05米，莲花圆座高0.2、下有方座高0.37米，四正四维各刻力士共8个扛座。上有八角盂顶，高0.4米。连顶带座通高2.02米。八面，各宽0.14米。分刻两咒，每咒四面。一咒每面4行，行30字；一咒每面5行，行35字，字左行，正书，有一面剥落殆尽，其余亦漫漶不堪。内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宝历二年（按：即公元826年）岁次丙午十二月一日，法性寺住持大德兼蒲涧寺大德僧钦造书。同经略副使将□（仕）郎前守辰州都督医博□（士）庐江郡何宥则，敬为亡兄节度随军文林郎康州司马宥卿造此大悲陀罗尼幢”。据《唐书·兵志》，唐初，于设兵戍守的边防要地设置军事组织机构。大的军队称“军”，小的称“守捉”、“城”、“镇”，统属于相当于军区的“道”，“道”设“经略军”以统辖。“道”的领导人称“大总管”，后改称“大都督”。又《百官志》载，都督府分上、中、下三府，各设“都督”

一员，“医博士”一员；大府从八品以上，下府正九品以上。经幢上所题“辰州都督府”，未知属大府抑中、下府。而“同经略副使”多一“同”字，这种职位，唐代史书未说得清楚。“钦造”是福建人，是法性寺（今光孝寺）住持。道光年间修纂的《南海县志·金石略一》，辑录有经幢刻字（咒不录）。（黄鸿光）

大鉴禅师殿记 嵌于广州光孝寺碑廊墙上。碑文叙禅宗六祖住光孝寺的经过。“惟番禺大都会也，禅师大道场也；地大则众杂而俗庞，道大则教行而类应。”这是赞人杰地灵的意思。碑高56、宽33厘米，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建立，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陈宗礼撰文，提举广南路常平义仓茶盐公事兼权运判冷应激题额，知南海县事王应麟书。陈宗礼与冷应激，《宋史》都有传，以廉谨能千著称。据清代钱大昕的考证，书写此碑的王应麟，是泉州晋江人，不是《宋史·儒林传》上的曾写《困学纪闻》的浚义王应麟。因为立此碑时，这个王应

麟已摄礼部郎官，正草拟《百官表》。

(黄鸿光)

祖师法性古像 本在广州光孝寺六祖殿，今移在殿前碑廊，是禅宗六祖惠能之像。碑高55.5、宽41厘米，呈圭形。像的形貌拙朴，似一老农，与六榕铜像的严毅秀整不同。碑阴有赞，题说：“至元甲午（按：元至元三十一年即公元1294年）住山法孙宗宝拜赞”，“泰定甲子（按：元泰定元年即公元1324年）七月二十八日住持风幡嗣祖比丘慈信拜立”。宗宝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重新整理刊刻《坛经》，今称“宗宝本”。

(黄鸿光)

重修光孝寺大藏经序 在广州光孝寺碑廊。撰人僧定晓为当时住持。立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碑高65、宽39厘米。碑文记明代正统十年（1445年）由皇室赐给全帙，共604函，经“一百五六十年”而残缺可嗟。僧人通轼，万里到北京，购求补坠，得司礼太监麦公帮助，得以补全。又得都督兰村公捐款制榭存放。这是梵夹本，即大折子本，通常称为“北藏”的佛经。此碑在《光孝寺志》卷十，全文辑录。

(黄鸿光)

光孝寺重修六祖菩提碑记 上端刻法性寺（光孝寺旧名）讲涅槃经师印宗及住持法才同立的《菩提碑》，碑下而刻菩提树图，居士区亦钹绘。碑高65、

宽36厘米，释通岸撰文，刻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碑文称：“宋朝求那跋陀三藏，建此戒坛，预讖曰：‘后当有肉身菩萨受戒于此！’梁天监元年（按：公元502年）智药三藏航海而至，自西竺国持来菩提树一株，植于戒坛，且立碑云：

‘吾过后一百六十年，当有肉身菩萨，来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今能禅师正月□日抵此，因论风幡语，与宗法师说无上道……于十五日普会四众，为师祝发。”

通岸（1566—1647），南海人，与陈子壮，黎遂球修复南园诗社，与诸名士唱酬。钱谦益《憨山塔铭》说，和憨山德清始终相依的，有通岸、通炯，及觉浪道盛等数人。可见通岸是德清的传法弟子。（黄鸿光）

光孝禅寺革除花卉供应碑记 在光孝寺碑廊。碑高65、宽35厘米。明天启二年（1622年）都纲僧起琪、住持行珮立石，王安舜撰文，吴光龙书。碑文称：光孝寺在明代广州是首寺，每有大节日，文武官员集会祝厘颂圣，所有费用均由寺出，“供应已烦”，而又“令其岁输草木之玩，当道恬而榷之，诸僧疲而供之，了无宁宇。”连官场摆设的花木，亦要由光孝寺供应。幸遇“浙中许比部粤游，憩住持行珮僧舍，睹兹苦役而兴轸恤，于时署郡符司理海宁董公，南、番邑令鸠兹罗公，晋安朱公，慨然发无上道心，特为议革。”因京中有人向代理广州府说情，才免去光孝寺为一府两县供应花卉的繁重差役。碑文在《光孝寺

志》全录。 (黄鸿光)

重修六祖殿拜亭题名 位于广州光孝寺。碑高67、宽33厘米。通岸题，住持行珮立。明崇祯九年(1636年)立碑。碑文说于崇祯二年兴工重修，7年后始立石(通岸事迹见《光孝寺重修六祖菩提记》条)。 (黄鸿光)

光孝寺重建六祖殿宇拜亭碑记

在《光孝禅寺革除花卉供应碑记》之碑阴，记述光孝寺乃是惠能落发受戒之地。碑高65、宽35厘米。长寿寺僧石濂大汕撰。刻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字为印刷体。碑文称：“本寺思念慈容，缘塑法身于授戒之所……前住持无际赞公……一肩独任，重建殿宇。”后列捐助者姓名，最前者为两广总督捐80两，最少者捐银仅1钱。《光孝寺志》辑录此碑。

石濂大汕(1632—1703)，本长寿寺僧，得平南王支持，从事海外贸易，并曾到越南传法。清远飞来寺、澳门普济禅院、广州长寿寺，都有他的建造。后因得罪浙人潘耒，谪于按察许嗣兴，被押送回籍，死于道途。 (黄鸿光)

重塑诸佛像碑记 在光孝寺碑廊。碑高72.5、宽40厘米，清嘉庆五年(1800年)立。江西欧阳健撰文。碑文记叙了光孝寺的历史沿革。寺址在孙吴时，原是虞翻的住宅，因种河子于其中，所以称为河林。后来昙摩耶舍，求那跋陀两位僧人前来，创建为佛寺。名为“制止”。晋时改为“王园寺”，至唐时，名“乾

明法性寺”。宋时改“崇明万寿寺”，又改为“报恩广孝寺”。到明代成化年间改为“光孝寺”，沿用至今。清代在大雄宝殿地方加一个“祝圣”的横额，是省级文武官吏聚集向皇帝表示祝贺或哀悼的地方。因近年诸佛及罗汉像全身剥落，寺的栏楯等亦残破，由江西人杨添茂、安徽人李广裕倡议，得到乡宦大中丞陈简亭的赞同，募款重修，于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兴工、至二年九月完工。

(黄鸿光)

光孝寺重修碑记 碑高70、宽34厘米，顺德李种汉撰文，首事李慎修，督修寺僧敬思，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立碑，今在本寺碑廊。碑文说募款年余，得数千两，开列捐款姓名，其余都无可记述。但这碑反映一个较重要的经济史实：当时外来的银元与我国市场的银两通用，且此时墨西哥银元输入中国已不少。银元上铸有鹰，故号“鹰洋”，“洋”是“洋银”的意思。每银元重7钱2分，鑿开为10等分，则得10角；这是今日称元称角的起源。粤人又分1角为2，重3分6厘。后来虽用纸币，仍用银元的旧称“大洋”，1元折铜元100分，5分仍称“3分6”。银店经手，验明成色真伪，打一钢印于上，积渐印多，便成“烂板”，价值亦降。龚自珍诗：“麟趾衰蹄迹可寻，何须番舶献其琛，汉家《平准》书难续，且学齐梁铸饼金。”是咏银元的。但楚的郢爱，汉的马蹄金，齐梁的饼金，都不具统一的重量，不利于流通，后来还是采取外国的办法铸银元，这也是中外贸

易的产物。道光年间修纂的《南海县志·金石略二》，辑录此碑记。（黄鸿光）

嶽雪樓鑑真法帖刻石 在光孝寺碑廊。分上下两行，共576块，每块长35、宽38厘米。南海孔广镛、孔广陶刻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刊刻前，由于孔氏已收购了南海吴荣光《筠清馆法帖》、番禺潘正炜《听枫楼集帖》中的珍品刻石，因而刊刻时，将这两种帖的刻石中的精品也包括在内。全帖年代由隋至清，刻工精细。洗玉清《广东丛帖叙录》记叙了此法帖，（黄鸿光）

禁妇女入寺烧香示 碑为花岗石刻。高61、宽29厘米。在光孝寺入门左侧路旁。清光绪七年（1881年）立。碑文开首即说：“男女之防，古今通礼，行

必异路，授受不亲，以别嫌明微也。”然后斥粤人之佞佛，并说：“本年五月初旬，海幢寺僧招引妇女多人，修建斋醮，夜以继日，众者如堵；物情沸腾，以至游客寺僧，互相捧喝、几酿事端。”因此要严禁妇女入寺，而且要男性亲属负责：“如敢于寺院丛林，仍前游冶，托为礼忏还愿，入寺烧香者，妇坐其夫，无夫则坐本妇；女坐其父，无父即坐其弟兄。僧道尼姑，不行拒绝，敢于招引者，该地方官一并锁拿到案。”这是广东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姚和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倪会銜的告示。此碑的历史价值在于表明，百年前，我国妇女虽入寺院作宗教活动仍无自由，妇女的宗教动机被歪曲为“游冶”，而“托为礼忏还愿”。甚至牵连全省的粤人也被斥为“佞佛”！可见百年前社会思想的一斑。（黄鸿光）

第二章 六榕寺碑刻

第一节 石 碑

证道歌碑 在广州六榕寺补榕亭侧。高78、宽30厘米。碑文相传为僧人玄觉所撰、苏轼手书，刻于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是六榕寺今存最早碑石。碑的两面皆刻字，碑石已破碎残缺，字迹漫漶，现存约800余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碎碑被合成一石。其正面篆额“皇宋广州重开永嘉”8字，但缺碑题。碑阴刻有楷书“证道歌碑”4字。

玄觉（665—713），温州永嘉人。俗姓戴氏。自幼出家，初学“天台止观”，后谒慧能于曹溪，因惠能留他住宿一夜，故后人称他“一宿觉”。他只是把学佛心得，向惠能印证认可，不算惠能正式弟子。后返温州，倡“天台宗与禅宗融合论”，死后被称“无相大师”。门人将其所著辑成《永嘉集》，但此歌未被收集内。

《证道歌》为七言的诗歌，以通俗

语言宣扬佛教，影响较大。歌词所说：

“君不见，绝学无为闲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这是把“佛性”看成自然无为的思想，纯任自然的修行方法，认为性本天然，不假雕琢，绝学无为，不加刀斧，便可作一个“本源自性天真佛”。是颇合禅宗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性论的。也与当时理学家朱熹所倡的“理”，是天地万物的根本相同。

据《释门正统》及《佛祖统记》载，《证道歌》由于有几句歌词涉及到禅宗世系：“第一迦叶首传经，二十八代西天记。”曾引起一些禅宗僧人的不满。在佛教文献中，此歌有两注本，宋代有知訥，元代有永盛，各撰《证道歌注》一卷，法泉有《证道歌颂》一卷。《证道歌》后

来被译成梵文，传至印度。清周韵生等辑《广东考古辑要·金石一》辑录此碑文。
(黄鸿光)

重修净慧寺千佛宝塔颂 碑高82、宽40厘米。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黄衷撰文，曾世昌书，李翱篆额。此碑特点在于记载了嘉靖十五年（1536年）及十八年（1539年），塔端夜半放光。这是物理学的尖端放电。此塔顶上放光的纪录，以唐仪凤元年（676年）为最早。及后万历间亦放光，见《广州府志》。当时人不识，以为舍利放光。嘉靖间住持净慧寺僧名德隐，塔放光后大设佛会，僧俗信徒云集，捐钱修塔，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动工，至二十九年（1550年）完成。
(黄鸿光)

重修广州净慧寺塔碑记 碑高54、宽33.5厘米。宋绍圣四年（1097年）赵叔盍撰并书。赵仲忽篆额。碑在宝祐二年（1254年）重刻，明弘治再刻，现存的是弘治碑。碑文说南海（今广州）“海舶贾胡，以珠、金、犀为之货、丛委于市，地大物夥，号称富饶”。又说广州当时风俗信佛，佛寺很多，未有佛塔，郡人前宝鸡主簿林修始议建塔。而实际上净慧寺在梁时名宝庄严寺，有舍利塔6层，在宋初焚毁，林修不过是在原地重建，与信士王衢，沙门道琮同为发起人，广其基45尺，掘地得9古井，中间有巨鼎，内藏3剑1镜，实为旧塔基之物。重建为8面9层。以元祐元年初议（1086年），绍圣四年（1097年）落成。这是记

载花塔重建经过的第一块碑，所以一再重刻。
(黄鸿光)

王文诰监摹苏轼“六榕”题字并跋 在广州六榕寺补榕亭侧。碑高32.5、宽77厘米。镌刻“六榕”楷书2字。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十月立。著名文学家、诗人苏东坡手书。仁和两广盐运使王文诰监摹并跋。字迹苍劲有力。据王文诰跋称：苏东坡于宋绍圣元年（1094年）被贬后，曾数次游广州，宋元符三年（1100年）九月，又偕其子苏迨到广州。广州安抚使程怀立等迎接，设宴款待，在净慧寺游览了一天，即席手题“六榕”寺榜。寺榜从元符三年至清嘉庆，屡经雕漆，后为防题款损坏，乃将其摹刻在石上，以传真迹。“文化革命”后，又据石刻复刻木榜，悬于寺门额之上。
(黄鸿光)

重修佛殿鲁班神殿碑记 碑高32、宽22.5厘米，清道光二年（1822年）两广盐运使经历王文诰撰并书。碑文叙述了净慧寺的变迁：洪武六年（1373年）将寺改为永丰仓，半毁于官。洪武八年，住持愈坚复建觉皇殿，改寺门为东向，殿后设崇龛，祀鲁班神。以岁久寺坏，乃集众募缘，历时四年始修复。这个碑的特色在于记载了觉皇殿并祀鲁班这一佛寺罕见的例子。因当时明朝官吏，对广东地方势力，采取打击态度，并严厉禁止人民对外贸易。花塔本为广州航标亦岌岌可危，但塔高57米，非专业建筑工人不敢拆卸，和尚遂造花塔为鲁班所

建之说，并设鲁班守望花塔的木刻像，使工匠不敢妄动。至明万历年间，慈山德清为镇守太监李凤立石像于花塔龕中，六榕寺有了这座靠山，鲁班的重要性便不显著了。宣统年间的《续修南海县志金石略二》辑录此碑记全文。

(黄鸿光)

重修六榕寺佛塔记 六榕寺现存最大一碑，嵌于花岗石浮雕双龙碑框内。清广州将军库穆长善撰文，副都统果尔敏书，光绪元年（1875年）立石，记述重修六榕寺佛塔经过。碑高92、宽35厘米。碑文记述：“广州都会，凭山瞰海，为百蛮锁钥，番舶连樯，宝货鳞集，固一大重镇也”。花塔“巍峨轮奂，雄矗天半。海舶收港，引为表望”。作者于同治八年（1869年）奉命来守广州，“地经兵燹，巍然独存，而多历年所，风雨剥蚀，半就摧残。遂谋诸僚友取拨于海防经费之羨余”，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秋动工，至光绪元年（1875年）夏修成。用海防军费修寺塔，甚至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反映了清政府的腐败。作者长善，正红旗人，是光绪珍妃、瑾妃的伯父，汉化甚深，对汉人很有好感。

(黄鸿光)

塔内八十八佛圣像图 在六榕寺。碑内刻八十八佛像及佛名。原塑像始于何时不可考。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重修花塔时，由关圣华塑像店重塑，此碑亦同时建立。碑高1.8、宽0.8米。八十八佛，实由《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

之五十三佛，及《大宝积经》卷九十八《优婆离会》和不空译《卅五佛名礼忏文》的三十五佛合成。释迦生前不许为他立像，佛寂灭后，则由三世佛演至三十五佛、八十八佛、千佛、三千大佛、诸天菩萨、四天王、天龙八部、五百罗汉等，遂成为偶像最多的宗教。有谑称之为“像教”。但自传入中土后，亦逐渐汉化，穿衣整齐，不似印度的半裸。已不断加入新的内容。如第15层有斗战胜佛，作猿猴捧桃状，此出于《西游记》的孙悟空。据此碑载，明清时亦在六榕供奉如仪。

(黄鸿光)

苏文忠公笠屐像 在六榕寺内，是苏东坡画像碑（图115），高59、宽28



图115 苏文忠公笠屐像

厘米。民国九年（1920年）云南赵蕃作。碑文说生平见苏轼像写本、刻本不下数十，大抵画家都以意为之，惟有翁方纲所摹南薰殿藏宋人写本，想是真实。所以临摹他的面容，仍用笠屐拄杖，来保存东坡昔日南来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风

范，交给六榕寺住持铁禅镌石。这画像碑是临摹与创作兼而有之。而容因是临摹自南薰殿本，肃穆而有俊逸之气；笠屐拄杖，则是典型的岭南谪宦形象，故能生动地表达东坡风貌。山东蓬莱阁亦供此像的拓本。（黄鸿光）

第二节 铜 碑

重修六榕寺花塔收支记 在广州六榕寺花塔后围墙上。沈载和撰文，林凤生书。碑文记述重修六榕寺花塔筹款经过。碑为铜刻，是石刻的变体。高62、宽28厘米。民国廿一年（1932年）广州佛教解行学社，在六榕炼石堂故址立解行精舍，有闽人赵士覲，持三密加持法，治好了蒋庆瀛的癫狂病，蒋认捐10000元，又治好邹静存之子，邹认捐5000元，以此为基础，佛教解行学社邀集200余人签名募捐，修理六榕寺及花塔，广州市政府也拨款1000元，但募捐所得甚少。第二次将所需瓦筒、瓦片、木料等开价，任人认捐，将捐者姓名刻在材料之上，得款颇巨。第三次因工程超支4000元，乃将4500元分为150“愿”，以30元为一“愿”，一人认一愿或多愿，多人认一愿均可，于是款足。此碑虽名为收支记，但收入总数实为含糊，只言“所得甚寡”、“得款颇巨”，是“寡”还是“巨”，终不明其实数。开支更一字不提。比照后碑，修塔仅用16500元，而募款则在20000元

以上。从碑文可见当时佛教的衰退，不得不“显密圆通”地合二为一，再三募款才能修好寺塔。（黄鸿光）

重修六榕寺花塔记 在六榕寺花塔后围墙上。梁致广撰文，胡毅生书。叙花塔自梁朝昙裕和尚分舍利建塔，宋代林修重修及历代修缮的事。此碑是铜板刻，高62、宽27厘米。据碑载民国四年（1915年）广州地震，“塔身与千佛柱亦随震而颤动甚剧，柱瓦之间遂发生裂缝，雨水时渗，内膛木材日就朽坏。”民国廿二年（1933年）闽人赵士覲捐款15000元倡修，历时19月竣工。民国廿四年（1935年）立碑。（黄鸿光）

重修六榕花塔工程记 在六榕寺。此碑是铜刻，碑文无撰者名，与其他铜碑相联，是重修六榕花塔工程记实。高62、宽29厘米，碑有工程记实7条：
1. 塔基负重力，2. 棚架搭法，3. 施工程序，4. 巩固千佛柱，5. 修饰宝

珠及九霄盘，6. 重修九级以下工程，
7. 重修花塔用料数量统计表。碑前有
《塔工记实》，载明尺寸、用料和余料堆
放之处，并有佛塔解剖图及用银16500余
元之数目。对工程施工、造价，均有详
细记录。（黄鸿光）

改造六榕寺花塔八十八佛像记

在六榕寺花塔后围墙上。民国廿四年
(1935年)立。胡毅生撰并书，是撰者
对六榕寺花塔八十八佛像的辩解。此碑
为铜板刻，高62、宽42厘米。据作者辩
说：八十八佛出自西夏护国仁王寺金刚
法师不空所集《大忏悔文》，“一切众生

始闻是佛名，能称名、能敬礼者，灭除
四重五逆及谤方等诸罪。”是净土宗的简
易赎罪方法。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
年)重修塔上佛像，已有八十八佛，至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又由关华塑像
铺重塑。撰者认为，不依《佛说造像量
度经》塑造，便是犯了“妄造减”。第一、
佛顶无肉髻。第二、化身佛应用手印表
示而用标帜，斗战胜佛竟然用桃子标帜
而塑成猴子之形，为孙悟空形象，尤为
不对。故一概打倒改为磁像。但手印无
法一一查出，只好用密宗手印以充数。
这反映了作者对待佛像的保守态度。

(黄鸿光)

第三章 南海神庙·浴日亭碑刻

唐 韩愈撰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碑高2.47、宽1.13米，24行，行15字，字约宽2.4、高2.8厘米。使持节袁州诸军事、守袁州刺史韩愈撰；使持节循州诸军事，守循州刺史陈谏书。额篆书8字如题，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一日立。原在殿侧东廊，今移置庙内头门西侧北向，保存完整。碑文叙述：元和十二年（817年）诏用前尚书右丞，国子祭酒孔戣为广州刺史，明年将夏，祝册自京师送到，叙戣祀神恭谨之状；明年祀归又扩大庙宫，并详叙孔戣在广州的德政。韩愈的文章写得好，其叙海岳的祝册，又可补两唐书《礼乐志》所未备，《孔戣传》的政绩全出于此碑。陈谏是唐代著名书家，郑樵《通志》举此碑为其代表作。欧阳修《集古录》说韩愈集子里的其他文章错字甚多，此碑独因拓本流传，错字极少。日本学者松浦章指出“海事”一词（航海技术、客运、货运等事）最早见于此碑，更显出它的科学价值。同治年间修纂的《番禺县志·金

石略一》，辑录此碑全文。（黄鸿光）

大宋新修广利王庙之碑 高3.72、宽1.59米。碑额盘龙，雕刻精细，由裴丽泽“奉敕”撰文，韩溥书。碑立于北宋开宝六年（973年），距潘美攻下广州仅两年。碑文说到自古交趾七郡贡献。自海沿江达淮，逾洛水到达南河，因岭南为刘氏窃据，近70年，贸易被阻绝，人民受虐待。因此派潘美讨伐，已把南汉刘铎俘虏。释放囚犯，赦免流人；另一件大事就是派中使修复南海神庙，希望获得神祐，“限蛮夷于六服，通七郡以来王。”即在巩固国防的基础上，加强朝贡形式的对外贸易。所以碑阴结衔，潘美就兼领市舶使，谢处玘以广州通判提举修庙，兼任市舶判官。录事参军林洵美监修。都是由皇帝特派，与一般规定用令丞掌葺治修饰是较高一级的规格。裴丽泽史迹不多见，韩溥是南汉的降官，史称他博学，善笔札，所以特命他写此碑。清代王昶曾把这碑和《宋史》比对，

发现《宋史》的错漏，如宋太祖的尊号就搞错。《潘美传》不写他当过襄州刺史，《韩溥传》不载他曾知端州军事等，都有参考价值。同治年间修纂的《番禺县志·金石略二》辑录此碑全文。

(黄鸿光)

明太祖御碑 碑高3.35、宽1.69米，黄宗羲《明文海》所载署名王祎撰，碑文是用明太祖朱元璋的口气写的，刻于洪武三年（1370年）。碑文说，五岳四渎，都是高山广水，它们的神，必受命于上帝，不是国家封号能加上荣耀的，所以一律取消前代封号，只简单称为某某之神。如南海神只称南海之神，而取消“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的封号。这一方面，是朱元璋以退为进，声称不敢超越上帝来封神，而在取消历代封号中，显示他“真命天子”的权威。另一方面，历代不断加封，已经使礼官为难，因为诸神的封号既累积而加长，皇帝及太后的尊号非要更长不可，不如把神的封号一概取消，来得干脆。

王祎，字子充，义乌人。《明史》卷二百八十九有传。朱元璋曾对他说：“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濂耳。”此碑为王祎任礼部侍郎时作。同治年间修纂的《番禺县志·金石略三》全文辑录此碑。

(黄鸿光)

明清 御祭碑 南海神庙是国家祀典规定祭祀的庙宇，历代帝王即位，求嗣、祈雨、止疫，平叛，都有祷于南海之神。因为撰写者都是一时之选，而

代祀的也是清要之官，所以每祭必立一碑，积累渐多，南海神庙便有“岭南碑林”的雅号，但碑一多，来往官吏索取拓本，寺僧负担亦大，便暗中有计划地毁去一些碑石。至“文化革命”期间，又遭破坏。今尚剩下御碑14块，除明太祖取消一切神号御碑外，其余13块，可分为四类：一是求保平安的，如“雨暘时若，国家清泰，灾疹不生”等，这一类有明宣德十年（1435年），景泰三年（1452年），正德九年（1514年，已残），清顺治三年（1646年，已残），乾隆十三年（1748年，现已被用作洗衣石，汉字部分几乎全部磨去，只剩满文一面）等5方。二是祈雨的这一类，有明正统九年（1444年）久旱的祭碑以及明成化四年（1468年，已残）的“多方灾疹，雨阳不时”，成化十三年（1477年）的“雨阳爽候，厉疫交行”，弘治六年（1493年）的“去冬无雪，今春少雨”等3方。三是告即位的，这一类有明天顺元年（1457年）的“复正大统”，弘治元年（1488年）的“嗣承大统，谨用祭告，神其歆鉴，佑我国家”两碑。四是求嗣的，这一类有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的“顾储宫未立，尤切于怀，伏望茂著神功，锡予元嗣”及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得子酬神碑。

从御祭碑看南海神的职能，仍保留非常原始的状态，它是兼司生育之神，还结合到民间的信仰，如相信到神殿前拜石睡一夜，便可得子，又如买一握神座后坎所藏的土回去喂猪，便可使六畜兴旺等。这都可以说明，海神其实是被

作为生殖神崇拜的。其后文明进化，生殖行为被加上种种限制，神之美德，一变而为惭德，试看民间关于“龙性淫”的神话便知。这是我们从煌煌御碑所得到的民俗学和神话学的资料。

（黄鸿光）

苏轼南海浴日亭诗碑 在南海神庙门外章丘上浴日亭。高1.54、宽0.84米。原石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打碎，寻回重拼。根据翁方纲所记，清代此碑下半已略损，所以碑之大小只能约略而言。正书五行，第一行是“南海浴日亭”诗题。其余四行各14字，诗曰：“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坐看暘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诗后题小字四行，行书：“右绍圣初元（按：公元1094年），东坡先生谪惠州，过浴日所作也。壁间今存小刻，乃后人所书，□微有舛异。筠旧得此真迹于湘中，嘉定辛巳（按：嘉定十四年即公元1221年）立夏，祇奉皇帝祝册来谒祠下，因出以寿诸石，□（以）补斯亭之阙，盖斯亭观览之伟，固自足以雄视海天，而此诗词翰之神，尤足以弹压千古，是可私其□□□无传也哉！清源留筠端父书。”清王昶说，根据广东旧志职官一栏记载，提点刑狱留筠，是留正的次子，端平年间（1234—1236）在任。考《宋史·留正传》，但说他的儿子恭、丙、端，都做过尚书郎。

不知广东旧志说留筠是留正的次子有何根据？此外《金石续编》又载此石有至元十八年（1281年）上将军都元帅白佐重刻的题记，漫漶到清代已不可全部辨认，今更一字俱无了。同治年间修纂的《番禺县志·金石二》辑录此诗碑。

（黄鸿光）

陈献章浴日亭和东坡韵诗碑 碑高195、宽88.5厘米，刻诗一首：“残月无光水拍天，渔舟数点落前湾；赤腾涵洞昨宵日，翠展苍茫何处山。顾影未须悲白发；负暄可以献龙颜。谁能手抱阳和去，散入千岩万壑间。”后题：“成化乙巳（按：成化二十一年即公元1485年）夏四月望后，翰林国史检讨古冈病夫陈献章书。”全碑以茅笔草书，极豪雄洒脱而自然。

陈献章（1428—1500），为明代广东著名的哲学家及书法家。新会白沙人，号白沙子。被荐至京，不为当权的丘濬所喜，便以母老及自身有病辞官。授翰林国史检讨，令回粤养亲。此诗有忠君爱国之意，题“古冈病夫”，是坚持不做官的意思。末联稍有讽刺之意，所谓“荔子沙螺芥蒂深”的表示。他常白缚茅草为笔，号“茅龙”。他的书法，一度盛行于北京。粤人入京，京城知识分子必问有无白沙的书迹。清周韵生等辑《广东考古辑要·金石一》，辑录此诗碑。

（黄鸿光）

第四章

药洲九曜石题咏丛刻

九曜石在教育路南方戏院侧，此地原为南汉刘葵官苑，苑中有湖，湖中有洲，洲上有九石，并多植花药，故名“药洲”。九曜石相传是刘氏罚罪人从太湖取石，航海而至广州。宋时“药洲”为广东转运使署所在。不少文人学士在此泛舟觴咏，刻石以纪游踪。清翁方纲、周中孚等有专著考证；钱大昕、翁心传、陆增祥以及省、府、县志，对此也多研讨记述。1932年，地方史学家汪宗衍博采诸家考证，重编《药洲九曜石题名考》，通计宋刻凡22处，著录人名59位。1988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重修九曜石，拨开淤泥苔藓，发现石刻凡81处。其中亦掺杂有后人移置于此的清代学使署碑刻，大都与九曜石无关。现收集部分有关九曜石题刻与九曜园碑刻叙录于后。

米芾“药洲”题字 题款为“药洲：米黻元/章题”7字分3行。是米芾于宋熙宁六年（1073年）所书，正书，左行。

米芾，宋襄阳人。字元章，号鹿门居士，又称海岳外史。尝寓居苏。为文奇险，特妙于翰墨，得王献之笔意，画山水人物，自成一家。官至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世称米南宫。

药洲在清代属学使署范围，而米题“药洲”此石，却被移到布政使署。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翁方纲为广东学政，向布政使索回宋果。咸丰年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使署被辟为法国领事馆，此石便落入外人之手。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之洞向法领事于雅乐索还，留在两广总督署。1929年中华民国政府收回法国领事馆址，改为广东省立图书馆及永汉公园（今儿童公园）后，教育厅长黄节请省政府将此石移置图书馆前，后图书馆迁回广雅书局旧址，此石遂留在永汉公园。50年代始将其移回原地，使九石璧合。民国年间修纂的《番禺县续志·金石志一》辑录有米芾“药洲”题字。（黄鸿光）

米芾九曜石诗 行书《九曜石》
五言诗：“九曜石，碧海出蜃阁，青空起夏云；瑰奇门怪石，错落动乾文。米黻熙宁六年（按：即公元1073年）七月”，共6行30字及1缺文。由清学使翁心传于道光六年（1826年）疏淤剔石，除去榕根，发现此石诗。后他在“九曜石诗”旁另刻《仙掌石新得米元章诗刻记》，记述他发现此石经过。民国年间修纂的《番禺县续志·金石志一》辑录有米芾九曜石诗。（黄鸿光）

许彦先诗刻 “花药氛氲海上洲，水中云影带沙流，直应路与银潢接，槎客时来犯斗牛。熙宁甲寅七年（按：公元1074年）上巳，彦先再游，移、穉、穉、穉、穉侍”。据《广东通志》载，诗的第一句，便说明“药洲”以种植花药得名，而非《南海百咏》和《古迹记》等说的是刘葵集方士炼药的所在。

许彦先，广东始兴人，字觉之。宋天圣三年（1025年）进士，熙宁五年（1072年）任广南转运使，元祐二年（1087年）知随州，得汉碑于舜子巷，乃徙置后圃，刻一诗于碑额。民国年间修纂的《番禺县续志·金石志一》收录此诗刻。（黄鸿光）

时仲等题名 为“时仲、公诩、积中同游，元祐丙寅年，春初八日题”，4行18字。原在清布政司署后堂东。三人都称字，而无姓名。钱大昕据另一石上《李之纪题名》，有“张升卿公诩”，又从《中吴纪闻》里考出孙载，字积中；郑樵

《通志》说孙是昆山人。元祐丙寅元年（1086年）张升卿为广东转运使，孙载是常平官。宋元祐元年闰二月二十八日，废诸州常平，那时距石上题字，仅早10天，当时的交通条件，诏书尚未到达，所以孙载仍应为常平官。至于时仲到底是谁，还是个谜。汪宗衍据英德碧落洞绍圣三年（1096年）《真阳太守游记》有“临川洪敏修时中”其人，说“中”“仲”两字相通，但仍未能确定时仲、时中是否同是一人。民国年间修纂的《番禺县续志·金石志一》辑录有时仲等题名。（黄鸿光）

翁方纲摹米芾题药洲石记 高1.38、宽0.76米。上摹“药洲，米黻元章题，时仲、公诩、积中同游，元祐丙寅年春初八日题”25字。下刻翁方纲题记：“二段共一石，石高三尺许，在布政司廨后堂东竹丛中，予访之四年余不获，至戊子九月，始披竹见之。乾隆己丑三十四年（按：公元1769年）春，方纲手摹勒石，置西斋东壁。”这是因当时米芾题“药洲”石在布政使署，几经交涉，仍不肯交回学使署后，翁氏乃手摹勒石西斋。

翁方纲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任广东学政，历三任8年，对九曜石一再题咏，还剔石疏淤植莲，可说是关怀备至。翁方纲《粤东金石略》辑录有翁氏摹米芾题药洲石记。（黄鸿光）

徐琪题药洲八景图跋 碑高32、宽45厘米，共18方，画八景八幅，而系

以诗八幅，加以跋尾。款题“花农夫子大人命画，门下士萧寿仁谨绘”，石为“光绪二十年（1894年）所立”。徐琪任广东学政时，把原为南汉药洲的庭院，经过

修葺，分为“校经晴日”、“光霁延晖”、“环碧新阴”等八景，嘱人绘图，自题诗并跋。徐琪是袁枚弟子。

（黄鸿光）